

#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的几个问题

——在全国中学《政治经济学常识》  
(下册)讲习会上的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吴树青

石 家 庄

一九八二年一月

# 目 录

- 第一讲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 第二讲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
- 第三讲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问题
- 第四讲 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问题
- 第五讲 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
- 附 录 答疑

# 第一讲

##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问题，就是下册开头那课即第六课的问题。这一课的主要内容是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问题，核心是公有制问题。

### 第一个问题，谈谈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们经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改造个体经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失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虽然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却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所以现在社会上一些人产生了一些想法。一些人看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困难，就提出：这种困难和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缘故？是不是我们过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缘故？而这个问题又是从基本理论上提出来的，因为基本理论讲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按照这

个原理，好象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我们国家在解放前生产力水平很低，我们未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革命胜利后一下子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不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再加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其中包括所有制方面也作一些调整，如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城镇发展个体经济，合资经营等等，这更增加了一些人的怀疑。所以，在研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时候，一部分人就提出，在我们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具备不具备物质基础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应该不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问题是前提。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再讲半天公有制的优越性也没有用，我们这本书也就会变成抽象的理论，讲的社会主义这套理论就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讲。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作为科学预见提出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来讲了，而是作为我们的生活实践来讲的。所以社会主义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是个实践问题。如果我们不懂得它，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现实的经济生活和现实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讲好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我们讲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有没有必要性的问题，也不可能越过这个规律。超过这个规律就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应当完全肯定，问题是怎样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我们国家公有制建立的客观必然性。那种说现在建立公有制过早了的观点，就是认为我们违背了这个规律。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有一先验论，有一个事先想好的固定模式，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应该有一个如何如何的生产力水平，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违背了这个规律。而这个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就是现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这个水平就是衡量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或物质前提。这种说法表面上看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但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那时，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进行了不到一个世纪，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是相当低的。到六十年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认为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了。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科学论断。马克思提出这个科学论断的时候，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煤产量每年不到一亿吨，铁产量每年不到五百万吨，就这么一个生产力水平。至于其它国家，如法国、德国还是小生产占优势，还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但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把社会主义代替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设想得很高。他认为当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了。

马克思认为当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已具备的主要根据，是一八二五年开始的，以后每隔十年左右就来一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但不能把生产力不断地推向前进，反而要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用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制度来代替。可见，马克思主义讲的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没有象现在我们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必须是现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没有断言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具体的生产力水平，相反，他们从来也不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在《德法农民问题》里，恩格斯说：我们无须等待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以后，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变革。这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等待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以后，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恰恰相反，允许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时候，还存在着大量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时候，只要客观条件允许，就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本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具体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说只有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百分之多少，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占百分之多少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那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等待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

展，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人口中占多数的时候才能进行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形式上看，它很尊重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正确地认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也没有正确地认识革命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曾把这种观点称作为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就是说，它形式上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它把这一理论庸俗化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庸俗化了，阉割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灵魂。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提出这一观点，是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别是用来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月革命。因为当时具备了革命形势，无产阶级有条件去夺取革命胜利，而他们却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提出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是考茨基，他写过一本书叫《无产阶级专政》，在第八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创造并积聚了巨额财富，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了多数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为可能，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他认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具备这个条件，特别在俄国，经济落后，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前，第二国际的头目们就用这种理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也有一些人鼓吹这种观点，认为俄国革命搞错了。十月革命是在经济很落后、又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的情况下实现的，革命胜利后一个时期，经济也很困难，甚至饭都没有吃。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把它归罪于革命，认为俄国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革命搞早了，是因为俄

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对于这种观点，当时列宁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确。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上这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怎么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一个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的这段话，也承认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在俄国还没有充分达到。但列宁并不因此认为俄国就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首先可以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去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由此可见，无论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都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他们都没有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看得很死，并不认为必须有一个什么高度的生产力水平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曾存在。党成立的初期，陈独秀机会主义贩卖的“二次革命论”，就是第二国际庸俗化的生产力论在中国的翻版。陈独秀认为中国生产力低，要搞革命，只能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这个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后，所走的道路应该是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等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力水平达到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再搞第二次革命。

我们党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不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这好比两篇文章，做好了上一篇，接着就要做下一篇。但是做下一篇文章，即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才能进行。



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应该由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来决定。我们应该运用这个基本观点来具体分析各国的情况，考察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能用公式来剪裁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不是什么历史事件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套。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观察、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原理来具体考察每一个国家的情形，才能得出正确的革命的结论。

为什么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又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又必须把两个问题区分开。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两者的要求不一样，而且差别是很大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上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当然要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它的物质基础。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制度，它所要求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这是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奴隶社会的物质基础比原始社会高得多，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比奴隶社会高得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比封建社会高得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比资本主义社会高得多。这是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这个制度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是一个比一个高得多的。那么，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怎么来的呢？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这个物质

基础就有。而社会主义革命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即这个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不是在新社会自身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而是在旧社会、旧制度中存在和准备起来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物质基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混淆。

为了使大家便于区分这两个概念，说明这两个概念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现象，我再说一点历史情况。我们可以拿资本主义来说，第一个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是英国。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当时英国还没有机器，基本上是小生产。但也有资本主义生产，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那时也有巨大的生产，但只是把许多人联合在一起，里面进行了一些分工。这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到作为产业革命主要标志的蒸汽机的出现，是在十八世纪。这时距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一百多年了。这就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物质基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的生产力水平是大机器，但大机器是十八世纪以后出现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十七世纪，中间隔了一个世纪。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条件是在旧社会里存在和准备起来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利用它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讲过：“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是建立在异已的生产力基础上，就是还没有它自身的技术基础。只有到大机器出现以后，才产生了适应资本主义自身需要的物质基础。”同样，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所需要

的物质基础，也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即生产力水平，不能简单地看它与将要建立的新制度是否适应以及适应的程度怎样，而是首先看这种生产力和旧制度的关系怎么样，也就是看旧生产关系能不能容纳它。如果旧生产关系能容纳生产力水平，那么当然谈不上革命，就提不出革命的要求来，就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如果说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已经和旧的制度发生矛盾，旧制度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新制度产生的基础就已经具备。

总之，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生产力，要看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要看矛盾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而不是看它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相适应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列宁当时提出落后国家可以首先进行革命，而且首先可以取得胜利，他所讲的革命的物质基础、物质条件，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从俄国来说，这个条件具备不具备呢？列宁认为具备这个条件。因为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首要特点是垄断，不仅在国内垄断一切，而且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垄断。其次，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等特点，使整个世界连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总体系。这个总体系已经腐朽了，已经过时了，已经进入到可以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了。所以，个别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一些，工人阶级的人数少一些，也不成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当然，落后国家也不是落后得毫无工业，毫无工人。这个落后是比较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的。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本身也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有一定的工业发展，一定的无产阶级力量。对俄国来说，十月革命的时候，比起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水平来说，相差五十到一百年。当时俄国的土地和人口分别占世界的六分之一和十二分之一，而工业总产值只占百分之二点七，工业产值在全世界的比重和它的国家很不相称，说明它比较落后。但从俄国本身来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中等程度的发展。1913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工业不但发展了，而且进入了垄断阶段。工人阶级队伍也壮大起来了，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起码的条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物质条件，所以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再拿我们中国来说，中国比俄国就更落后了。但是，我们同样有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一定发展，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是具备的。解放前的中国，大机器生产不发展，但也占了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产业工人有三、四百万，如：加上运输等行业，大概有二、三千万。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不发达，但中国资本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集中。抗日战争以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一九二七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共有42.96亿资本，其中外资占68%，官僚资本占4.8%，民族资本占27.2%，主要部分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交通运输资本的净值是39.14亿，其中外国资本占89.8%，官僚资本占6%，民族资本占4.2%。这两个加起来，即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生产共80多亿资本，其中外国资本占78.4%，官僚资本占5.4%，民族资本占16.2%，这是抗战前的情况。资本集中，但主要集中在外国资本家手

里。外国资本主要部分又是日本资本家的。抗战胜利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投资以及德国、意大利在华资产转到官僚资本手里。再加上从抗战期间到解放前夕，官僚资本通过巧取豪夺、兼并、剧烈膨胀等手段，使官僚资本占了全国固定资产的80%以上。这个非常集中的官僚资本是最腐朽、最反动的。在官僚资本的压榨下，劳动者没有丝毫积极性，就是其生产资料也不能很好利用，经营管理极端腐败。官僚资本本身带有很大的买办性、封建性，所以依靠官僚资本发展生产力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依靠民族资本行不行呢？民族资本同样不行。因为中国的民族资本本身很薄弱，是在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夹缝中间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有很大的软弱性、妥协性，依靠它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生产力，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帝国主义忙于互相厮杀，民族资本有了比较快地发展。解放前夕，我国全部近代化生产的固定资产有128亿元人民币的价值。一百年的时间就只搞了这么一点东西。其中的民族资本，我们56年搞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给民族工商业清产核资，结果是22亿固定资产。这22亿是什么意思呢？即相当于我们解放后建设一个鞍钢所筹的资金，也就是全国民族资产阶级搞了一百多年，只搞了一个鞍钢。依靠这么一个经济力量的阶级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显然是不行的。

历史充分说明，在中国依靠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生产力是行不通的，只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所以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具备物质基础，不应该搞，这既

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历史发展证明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当然，由于我国原来生产力水平低，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后，我们所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很高。我们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而只能理解为：因为我们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所以在革命胜利后不可能建立很高程度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开始进行革命，而在革命胜利后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自身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为什么没有充分发挥优越性呢？就因为两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就是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程度不很高，受到原有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总想把公有制水平建立得越高越大。正因为有左的指导思想，所以在改造旧的经济成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时候，确有过背离生产力的现象，新建立的生产关系没有充分反映生产力的水平。公有化程度过高，不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另外，本来应在这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没把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而把力量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放在抓革命、抓阶级斗争、抓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样，后来就出了一些问题。这都是属于工作中的缺点，其中包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但这并不等于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和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基础、物质条件相联系的，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的问题。我们知道，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革命的客观要求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道理。但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爆发革命，这不仅仅看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的状况只是从根本上决定这个革命有没有可能，有没有物质基础或客观依据。在同样具备客观依据的情形下，什么地方先革命，什么时候能够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看其它的因素。因为革命是人们的暴力行为，这里面还有人们的主观努力。因此，还要看无产阶级组织的程度怎样，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群众的联系怎样，统治阶级本身的组织能力、解决矛盾的手段如何，革命政党有没有正确的战略、策略等等。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所以，这些条件不具备，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也不可能进行革命。

个别国家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要落后，但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一些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革命的客观形势成熟得比较慢，这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并不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只是提供了革命的客观依据。革命本身要用新的制度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里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层建筑的力量怎么样的问题。一般说来，某种经济制度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国家，它就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基础，有较强大的上层建筑。在这种情况下，对解决社会矛盾，比起落后的国家来说，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它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来调节这个矛盾，缓和这个矛盾。从工人运动历史上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有许多殖民地，它对外侵略、掠夺了大量高额利

润；它拿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缓和其国内矛盾。所以社会经济制度比较发展的国家，一般说来，它具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调解矛盾的手段多一些，对新社会制度的诞生可以设置更多的障碍。因此，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两者可能比较尖锐，因为它的生产力发展比较高，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较大。但是这个生产关系不是自行灭亡的，总是要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革命去把它推翻。要革命的话，就要碰到一个旧的上层建筑对旧的制度的保护的问题。所以，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比较强大，它的上层建筑比较有力量，可以利用各种手段调节矛盾，革命的主观形势反而成熟较慢。而一些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本身经济力量比较薄弱，所以它的上层也不怎么坚固，社会矛盾在这些地方反而容易集中，国内外矛盾都可能交织在这个国家。这样，比起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来说，统治阶级缺乏更多的回旋余地，缺乏更多的调节手段，所以有时在这样一些国家，革命形势成熟得比较早，容易爆发革命。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成正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是说明了生产关系如果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它。但具体在什么时候代替，哪一个国家首先突破，还要看其它的因素。革命总是矛盾激化的结果。哪个国家的矛盾尖锐到不能解决的时候，脓包就首先在这个地方突破。这种情况，常常并不是同生产力水平成正比。不是说生产力水平越高的地方，革命时机就一定越容易成熟，越容易革命。相反，恰恰是一些落后的国家首先爆发革命。当然，前提是具备了革命



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有，过去的社会革命也有。这说明，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革命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不能机械地考虑。列宁讲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他讲的恰恰不是最发达的国家，而是中等的或比较落后的国家，道理就是上面讲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机械。胡耀邦在庆祝党的六十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特殊的历史条件，既包括矛盾比较集中；已经证明资本主义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也包括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正确的战略策略，正确的路线、方针以及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等等这样一些主观努力。正因为有主客观两个方面成熟的条件，所以才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那种认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不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观点，是不对的。

## 第二个问题， 讲讲三大改造的客观依据问题。

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现在对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一些问题。